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目的

濁水溪是臺灣最長的河流，其下游也是彰化平原與嘉南平原之人文、地理空間重要的界線。南岸的荊桐鄉、西螺鎮、二崙鄉及崙背鄉（即本計畫所指之「西螺地區」，清代屬西螺保及布嶼保），乃為全臺最大的漳州客語區，在此地生活的客籍人士稱作「詔安客」。<sup>1</sup> 過去對於西螺地區的「詔安客」研究雖累積不少成果，<sup>2</sup> 但對於民間信仰及村際網絡的研究，成果仍相當有限。申請人在撰寫碩士論文期間，曾經在西螺地區從事多次田野調查，發現當地仍然保有「謝平安」的習俗。

「謝平安」為漢人社會春祈秋報的民俗觀念。農曆年底舉行「謝平安」祭祀活動，對地方居民而言，是一年中相當重要的祭典。當天晚上須演戲酬神、宴請親友，因此又稱作「冬尾戲」。按農村社會以農為業，過著靠天吃飯的日子，每逢歲末收穫完畢，居民舉辦村落集體祭天儀式，村民敬備豐盛祭品，誠意迎請村落守護神及諸神前來作客，叩謝上祇一年來的庇佑，使農稼豐收、六畜興旺，故也稱作「謝平安」。

清代西螺保內「謝平安」時間，以西螺街的伽藍爺廟作為指標。自乾隆59年（1794）年開始，每年農曆10月18日伽藍爺廟謝完平安後，保內各聚落始能進行籌神，已形成一種傳統。此一現象的產生，必須由伽藍爺公的神格進行說明。依廟內楹聯「權比城隍百姓心崇雙靈蹟」、「功同福德一龕相繞萬家煙」，說明其不僅具有城隍，且有福德正神的職能。<sup>3</sup> 而城隍本身為鎮守土地之神，西螺保內諸事務皆由其掌理。<sup>4</sup>

由附錄一所示，「謝平安」時不僅今西螺鎮內居民有迎請福興宮及廣福宮媽祖作客的習俗，甚至擴及周遭的林內鄉、荊桐鄉及二崙鄉，超過五十三庄的規模。舉「謝平安」為歲末聚落集體謝神的儀式，是以清代組織自然村的「土名」，即日治時期大字的「庄（小字）」為單位，甚至由「角頭」進行的

1 邱彥貴、吳中杰，《臺灣客家地圖》（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01），頁61-63。

2 參見廖本全，〈空間規劃與聚落空間性轉化之研究——西螺地方的構成〉（臺北：臺北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李佳穎，〈西螺地區「張廖」宗族特色與在地歷史發展〉（臺南：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李雪濤，〈西螺七欠發展之研究〉（雲林：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碩士論文，2008）；許瑛玳，〈雲林詔安客文化圈形成——以崙背、二崙兩鄉鎮為例〉（桃園：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廖婉粧，〈張廖族人的移入大西螺地區與社群組織之發展（1683-1895）〉（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

3 依大正4年（1915）日人的記錄，伽藍爺廟主神為「城隍爺」。參閱不著撰者，1915《社寺廟宇二關スル取調査・嘉義廳》，西螺公學校區域・十二、伽藍爺，無頁碼；另據自民國38年參與廟務的程求安（1926年出生）亦表達同樣看法，2010年5月7日筆者採訪。

4 增田福太郎，《臺灣漢民族的司法神：城隍信仰的體系》（臺北：眾文書局，1999），頁144。

祭拜儀式。以最小區域（土名或角頭）為單位，迎請西螺媽祖前往作客，說明西螺媽祖為五十三庄內最具優勢的主神，<sup>5</sup> 其地位凌駕各角頭的地方神祇。一般而言，聯庄主神的形成與其所在地域的歷史發展、家族勢力與族群關係等息息相關。<sup>6</sup> 究竟為何荊桐、二崙、林內，要至西螺街迎請媽祖作客？前舉各鄉鎮與西螺街存在何種關係，值得釐清。此外，「謝平安」儀式中迎奉西螺媽祖作客的村庄，多有流傳迎西螺媽祖作客淵源的故事，足以反映人群與信仰網絡關係。

另外，「謝平安」的儀式過程也相當值得記錄。各街莊為籌備「謝平安」活動，會在前一年活動結束前，隨即對天公（或三官大帝）或境內主要廟宇主神前擲筊，獲筊數最多者即任「爐主」，負責籌辦新年度祭祀事宜；次多者為「頭家」，協助爐主辦理相關事務。另外，頭家必須負責向街莊各戶「題丁」，也就是徵詢境內居民參與的意願。有意願者，需向其徵收「丁口錢」，作為祭祀費用。丁口錢的收取方式，男女分開計算，男子為「丁」，女子為「口」。由前舉可知，無論各街莊「謝平安」日期擇定的差異、「丁口錢」收取範圍的界定，說明「謝平安」活動具有特定境域範圍，也就是反映了相當程度的地域性及排他性。

本計畫「濁水溪下游西螺地區「謝平安」活動之調查與研究」針對濁水溪下游西螺地區作一貫時性的討論，一方面透過文獻研究，從歷史演變的過程，討論西螺溪下游地帶閩、粵族群關係，以及西螺地方社會發展的複雜性；另一方面輔以田野現況的調查，剖析西螺街媽祖信仰背後的人群、商業與交通網絡的形成，試圖全面性掌握人群、宗教與地方社會的形塑過程。換言之，本計畫從「地域史與族群關係史」的觀點，以現今「謝平安」活動為中心，透過漢人聚落形成、宗教信仰發展與族群關係變遷的討論，考察西螺街媽祖信仰網絡的形成。其目的為釐清社會人群與媽祖信仰在濁水溪下游地方社會形塑過程中的相互關係。

5 臺灣西部平原多有聯庄組織廟宇出現，其中以宣稱五十三庄者最常見。參閱林美容，〈臺灣區域性宗教組織的社會文化基礎〉，《東方宗教研究》2（1991年），頁345-364。

6 雲林地區聯庄信仰的討論，已有相關成果。請參閱徐雨村，〈宗族與宗教組織原則的轉換與並存——以雲林縣六房天上聖母的祭祀組織為例〉，《思與言》34：2（1996年6月），頁175-198；三尾裕子，〈從地方性廟宇到全臺性廟宇：馬鳴山鎮安宮的發展及其祭祀圈〉，收入於林美容主編，《信仰、儀式與社會》（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3），頁229-296；邱彥貴，〈新街三山國王與五十三庄——管窺北港溪流域中游的一個福佬客信仰組織〉，《臺灣宗教研究》3：2（2005年4月），頁1-56。

## 第二節 研究回顧

近三十年來，從臺灣各地的區域研究，到各地方文化研究的多樣性探討，已累積十分豐富的成果。其中西螺溪南岸的雲林、嘉義地區，無論平埔研究、漢人開墾歷史及信仰活動的成果，累積不多，相關基礎研究仍有待開發。本計畫主要在區域歷史研究的範疇下展開，藉由信仰與社會人群的互動關係，分析濁水溪下游地域信仰文化、村際關係的形成，並考察信仰之於不同人群間的社會發展，尤其埔、漢關係中的宗教議題與漢人地方社會的形成、特色。因此相關文獻回顧，將包括臺灣民間信仰與地方社會研究、西螺地方社會研究兩方面。

### 壹、臺灣民間信仰與地方社會研究

日本學者岡田謙〈臺灣北部村落之祭祀範圍〉一文，藉由今臺北士林的漢人村落社會祭祀活動，討論臺灣村落之祖籍團體、家族團體的特色，並指出祭祀圈與市場圈及通婚圈有所關連。<sup>7</sup> 1970年代，學界推行「臺灣省濁水、大肚溪兩河流域自然與文化史科際研究計畫」（簡稱「濁大計畫」），參與該計畫的人類學家施振民將祭祀圈概念化，並藉以分析彰化平原之信仰、族群與聚落三者間的組織模式。<sup>8</sup> 許嘉明亦應用祭祀圈概念研究彰化平原，並提出祭祀圈範圍的界定問題。<sup>9</sup> 爾後，林美容重新確認祭祀圈的概念及其內涵，<sup>10</sup> 進一步提出信仰圈的概念，修正了祭祀圈無法解釋跨區域信仰的問題。<sup>11</sup> 然而由於林氏缺乏貫時性的考察，使得祭祀圈與信仰圈研究的進展有其困難。

隨著祭祀圈與信仰圈模式的建立後，學界開始思考該理論的適切性。其中張珣提出「後祭祀圈時代」，認為既有研究著重於宗教組織的解釋，應更進一步思索地方社會背後所蘊含的社會、文化、經濟等因素，及其社會網絡如何形成的問題。<sup>12</sup>

除了祭祀圈與信仰圈模式的討論外，信仰與地方社會關係的研究，涵括

<sup>7</sup> 岡田謙著、陳乃藥譯，〈臺灣北部村落之祭祀範圍〉，《臺北文物》9：4（1960年12月），頁14-29。

<sup>8</sup> 施振民，〈祭祀圈與社會組織——彰化平原聚落發展模式的探討〉，《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36（1973年秋），頁191-206。

<sup>9</sup> 許嘉明，〈彰化平原福佬客的地域組織〉，《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36（1973年秋），頁177-184；許嘉明，〈祭祀圈之於居臺漢人社會的獨特性〉，《中華文化復興月刊》11：6（1978年6月），頁59-68。

<sup>10</sup> 林美容，〈由祭祀圈來看草屯鎮的地方組織〉，《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62（1987年12月），頁53-114。

<sup>11</sup> 林美容，〈由祭祀圈到信仰圈——臺灣民間社會的地域構成與發展〉，收入於張炎憲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三）》（臺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1988），頁95-126。

<sup>12</sup> 張珣，〈祭祀圈研究的反省與後祭祀圈時代的來臨〉，《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58（2002年6月），頁78-111。

諸多層面，舉凡族群與聚落發展、商業經濟、文化變遷等均有著複雜、糾結的關係。學界已有相關成果，如洪麗完以清水平原三山國王廟為中心，討論閩粵漢人族群關係的演變。透過其分析，顯示地方廟宇研究係是作為理解族群關係的重要途徑。<sup>13</sup> 宋光宇以霞海城隍祭典的觀察，提出寺廟祭典與地方經濟之關係；<sup>14</sup> 王志宇以地方菁英參與慈和宮修建，作為自身影響力的提升途徑的分析。<sup>15</sup> 此外，康豹（Paul Katz）運用西方理論（公共領域、象徵資本等），探討廟宇與地方社會關係，開啟信仰與地方社會的另一研究取徑。<sup>16</sup>

總之，從祭祀圈與信仰圈研究以來，學界藉由寺廟解釋漢人族群、地方社會、文化等議題，已留下相當豐富的成果。儘管透過祭祀圈與信仰圈概念的運用，可以對當代或特定時間內的信仰狀況提供表象的解釋，對於地方社會貫時性的討論，卻需透過文獻研究，從歷史演變的過程，討論族群關係與地方社會發展的複雜性，並輔以田野現況調查，剖析宗教活動背後人群網絡的形成，始能全面性掌握人群、宗教與地方社會的形塑過程。換言之，本計畫將在文獻、理論與田野三者間掌握埔漢族群、民間宗教與地方社會三者間的關係，從而勾勒西螺溪下游沖積平原的地方社會特色，並釐清西螺街福興宮等民間宗教活動與人群關係網絡之由來。

## 貳、西螺地方社會研究

關於西螺地域的討論，梁志輝〈清代雲林地區平埔族討論〉一文，將雲林分為斗六丘陵、濁水溪沖積扇及海岸隆起平原等三地域進行討論，指出土地開發與平埔社群文化展現的地域關聯特色，並試圖提供不同的族群分類思考，乃針對雲林地區平埔社群較詳盡的討論。<sup>17</sup>

除了梁文外，絕大多數研究為以漢人社會為主體的陳述。其中以廖本全的討論較有系統。作者透過文化歷史脈絡的詮釋，分析原為平埔原住民巴布薩（Babuza）族的生活領域，如何經漢文化的入殖及現代化過程呈現的聚落，考察西螺人現代生活空間規劃的發展脈絡、內涵與轉變。<sup>18</sup> 雖然受資料的囿限，其對平埔族西螺社的討論，僅限於生活型態上的描述，卻不失為西螺地

<sup>13</sup> 洪麗完，〈清代臺中地方福客關係初探——兼以清水平原三山國王廟之興衰為例〉，《臺灣文獻》41：1（1990年6月），頁63-93。

<sup>14</sup> 宋光宇，〈霞海城隍祭典與臺北大稻埕商業發展之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2：2（1993年4月），頁291-336。

<sup>15</sup> 王志宇，〈民間信仰與地方社會——以清代及日治時期的苑裡地區為例〉，《社會科教育學報》6（2003年7月），頁91-110。

<sup>16</sup> 康豹，〈慈祐宮與清代新莊街地方社會之建構〉，《北縣文化》53（1997年6月），頁71-78。

<sup>17</sup> 梁志輝，〈區域歷史與族群：清代雲林地區平埔族群討論〉，收入於劉益昌、潘英海主編，《平埔族群的區域研究》，頁141-162。

<sup>18</sup> 廖本全，〈空間規劃與聚落空間性轉化之研究——西螺地方的構成〉（臺北：臺北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

方研究的重要參考。

近年由於受到客家相關研究蓬勃發展的影響，西螺地域的詔安客研究，已累積不少成果。如許瑛玳的〈雲林詔安客文化圈形成——以崙背、二崙兩鄉鎮為例〉，試圖跳脫因行政區域規範的地理空間限制，代以「詔安客文化圈」的概念，從詔安客聚落的開發、社會語言的使用、宗教信仰及祖先崇拜等面向，進行當代詔安客文化的觀察。<sup>19</sup>

其次，針對西螺地域的張廖氏家族研究，亦是目前雲林研究中受到最多人注意的議題。如李佳穎〈西螺地域「張廖」宗族特色與在地歷史發展〉，說明張廖家族在詔安客語、風俗習慣等呈現之族群文化特色。<sup>20</sup> 李雪濤〈西螺七欠發展之研究〉，以張廖氏族人聚集的單姓村，即西螺「七欠」的二十五個聚落為研究範圍。作者從文獻的爬梳，輔以田野調查，整理出張廖氏渡臺開拓的時間，並透過河道變遷、埤圳的開發及聚落的形成時間等，分析張廖氏聚落基址選擇的考慮因素，並及其聚落聯防狀況。雖然該文企圖由「人地關係」及「人與人之間的互動」

兩個面向，推衍出濁水溪沖積平原整體的開拓過程與族群勢力消長情形。<sup>21</sup>

廖婉粧〈張廖族人的移入大西螺地域與社群組織之發展（1683-1895）〉，主要以「大西螺地域」（今雲林縣西螺鎮、二崙鄉、崙背鄉）為探討範圍；該區域亦是張廖宗族在臺的主要發源與繁衍據點。作為一個閩南移墾的宗族研究，廖文著眼於張廖家族如何透過聚落、祭祀圈等地緣組織、宗族與祖公會等血緣和民間結社，藉以凝聚族人、結合人群，達到「收族敬宗」之效，並適應「大西螺地域」特殊的時空環境，以解決其所遭遇的種種問題。<sup>22</sup>

此外，亦有針對詔安客鍾姓宗族的信仰個案研究。如張婉妤〈崙背鄉迎媽祖與著年輪祀研究〉，以今崙背鄉枋南新庄迎奉西螺街福興宮及廣福宮媽祖回莊遶境為例，透過遶境的產生、輪祀方式等，試圖解釋媽祖信仰如何內化為崙背地區庶民生活的一部分，並成為當地詔安客的主要信仰。<sup>23</sup>

廖珠伶〈西螺——一個農業市鎮的社會經濟變遷（1895-1945）〉一文，從交通位置、商業機能的分析，說明西螺作為濁水溪下游各市鎮的樞紐角色，並論及地方菁英與地方社會的關係；<sup>24</sup> 有助於西螺地方歷史的整體認識，亦能提供西螺街作為詔安客信仰中心的脈絡思考。張奉珠〈詔安客家廟祭祖研

<sup>19</sup> 許瑛玳，〈雲林詔安客文化圈形成——以崙背、二崙兩鄉鎮為例〉（桃園：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sup>20</sup> 李佳穎，〈西螺地域「張廖」宗族特色與在地歷史發展〉（臺南：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sup>21</sup> 李雪濤，〈西螺七欠發展之研究〉（雲林：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碩士論文，2008）。

<sup>22</sup> 廖婉粧，〈張廖族人的移入大西螺地域與社群組織之發展（1683-1895）〉（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

<sup>23</sup> 張婉妤，〈崙背鄉迎媽祖與著年輪祀研究〉（嘉義：中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sup>24</sup> 廖珠伶，〈西螺——一個農業市鎮的社會經濟變遷（1895-1945）〉（桃園：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究——以雲林縣崇遠堂為例），有別於既有成果，主要透過崇遠堂的祭祖儀式、祭品等進行討論，並比較詔安客的今、古禮節間的差異。<sup>25</sup>

如上所述，近年西螺地域的相關研究，大多以詔安客——特別是張廖宗族為研究對象，探討其家族組織、勢力發展等議題，然而關於張廖等姓詔安客之形成，多認為詔安客的墾拓環境原為漳人所佔居，卻未顧及西螺地域人群變化的趨勢，孰不知詔安客的分布空間是多次械鬥後整合的結果。同時，張廖、李姓的收族也是在同樣的背景下產生。那麼究竟西螺溪下游詔安客人群於何時形成？值得釐清。另一方面，在從事張廖宗族研究時，忽略其與當地他姓重要家族互動關係，如同屬詔安客的李姓、鍾姓，以及泉籍墾戶張士箱家族等在地方社會形成中的角色。其次，作為地方人群互動關係的探討，埔、漢族群關係的釐清對於地方社會形塑過程的了解不可或缺。對平埔社群的歷史變遷，前述論文大多缺乏討論與分析。近來由於平埔文化復振運動，平埔族裔多願意面對本身祖源問題，積極找尋本身歷史；加上筆者多年來持續從事田野工作，蒐集不少地方家族古文書資料，也發現一些平埔族裔的足跡，並進行口述訪談，均有助於其歷史變遷的討論。再者，清代西螺溪水患頻仍，其與宗教信仰發展的關係，如西螺福興宮、廣福宮為主的信仰是否與水災有關？以及西螺媽祖信仰所呈現的人群社會網絡，已有研究均無完整的討論。本計畫擬針對以上研究議題的不足，進行分析，期以整體呈現西螺地方社會的宗教活動與人群關係。

###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資料

#### 壹、研究空間

大致而言，介於今日濁水溪（舊稱西螺溪）及新虎尾溪之間，即今雲林縣北端的西螺鎮、二崙鄉全部、崙背及荊桐鄉部分地區，清代行政區劃包括西螺保與布嶼東、西保，屬臺灣西部濁水溪沖積扇平原之一部分。此一地理範圍正好與地方宗族，如「詔安客」張廖姓宗族的勢力範圍一致，<sup>26</sup> 也是今日西螺街福興宮、廣福宮媽祖遶境活動中最多廟宇參與的範圍。換言之，基於張廖姓宗族勢力範圍、清代行政區劃由來及媽祖遶境範圍等因素，本計畫將研究範圍定為西螺溪下游沖積扇平原地區，並以清代西螺街的媽祖信仰為

<sup>25</sup> 張奉珠，〈詔安客家廟祭祖研究——以雲林縣崇遠堂為例〉（雲林：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sup>26</sup> 即張廖家族的西螺「七崁」，是作為族群意義的祭祀圈輪祀組織。「崁」的用法源於詔安客語，本義為「角落」，而後逐漸成為人群聚集的聚落的象徵。參閱簡瑛欣，〈宜蘭廟群 KHIAM（示簽）祭祀圈之研究〉（臺北：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04），頁 18-23。

中心，試圖釐清今日西螺地方社會以西螺街福興宮為中心的宗教活動與人群關係的歷史脈絡，期以完整呈現地方社會的形成與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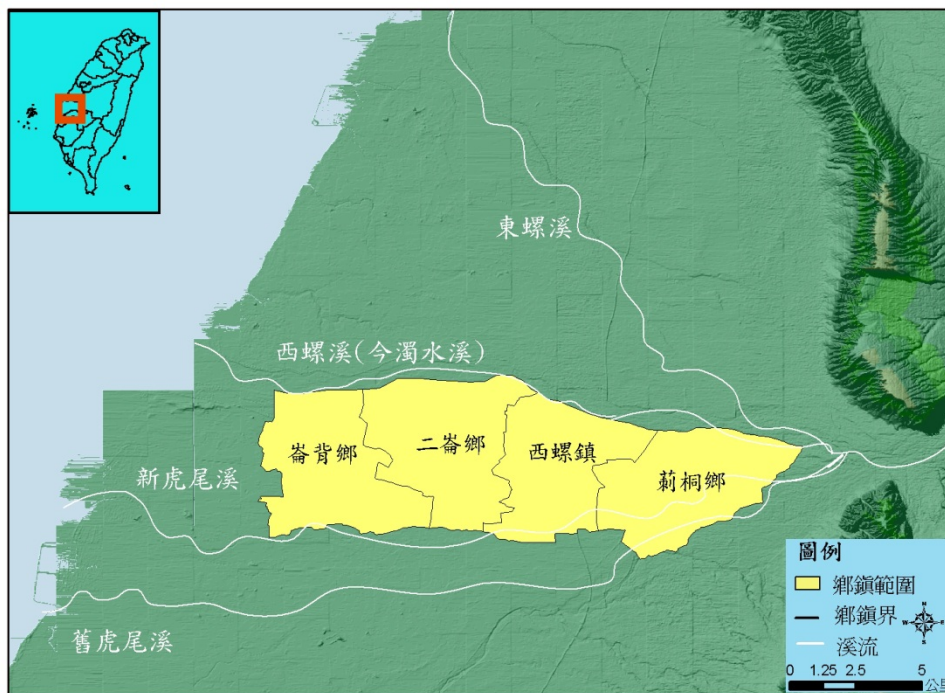


圖 1-1 本計畫主要探討區域之西螺地域範圍

資料來源：筆者使用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 GIS 系統繪製。

## 貳、研究取徑

本計畫主要採取的文獻分析及田野深度調查等研究方式，茲簡述如下：

### 一、文獻分析

區域社會研究，首先應了解被研究區域的相關歷史沿革、地理環境，與地方生活習俗。是故透過文獻蒐集與史料的解讀，目的是由歷史視野來看待地方社會。相反地，亦可由地方社會來建構歷史，也就是藉由庶民史料（戶籍與地籍資料，以及公私藏古文書等）與政府史料交織辨證，釐清地方歷史特色。

簡言之，本計畫將經由文獻蒐集與史料解讀，以釐清漢人移墾時期西螺地域的社經面貌，從移民人群的原鄉祖籍來源、在臺遷移史、族群互動情形，探索移民與原住者間的社會狀況及族群勢力消長、文化交流情形。

## 二、田野調查及深度訪談

除文獻分析外，本計畫尚須配合田野工作，收集文獻紀錄不足的相關資訊。田野工作是民族學、人類學界慣用的研究法，主要運用的策略為「參與觀察法」及「深入訪談法」。藉由長期的田野工作過程，以參與觀察法融入社區生活，再以深入訪談法，記錄當地的日常生活，諸如生活概況、生命史、人際互動情形、宗教信仰以及特殊節慶活動等，除了可了解社群生活的空間及社會文化環境外，透過民族誌採取的整體觀，可獲得被研究社群全面且完整的圖像。

有關具體田野工作，說明如下：

- (一) 謝平安祭典的記錄：記錄各個村莊謝平安祭典的進行過程。包括居民的祭品內容、請奉作客神祇、科儀宣行的經過、頭家爐主選任等，能有清楚的描述，亦能藉此掌握各村庄的祭典差異。
- (二) 儀式專家的訪問：透過對於道士、鸞堂的鸞生、乩童等儀式專家進行訪問，以求對於謝平安的祭儀，能有更一進步的掌握。
- (三) 聚落史的記錄：記錄村莊開發的歷史及當地重要氏族之發展史。
- (四) 宗教信仰的踏查：由祭祀範圍的概念切入，以了解當地主要的宗教信仰，並以寺廟史為中心，分析其興建、遷徙、分靈等活動，作為分析人群互動方式。
- (五) 口述歷史的採集：透過生命史或一些代表性事件等歷史訪談紀錄，以作為呈現地方、族群意識形塑的參考。另一方面也記錄過去謝平安祭典今昔的差異。

## 參、研究材料

針對本計畫研究重點，筆者主要收集清代檔案、方志等文獻資料。另一方面，也利用日治時期各類檔案資料。如臺灣總督府於明治 37 年（1904）完成土地調查事業後，隔年（1905）即利用地籍為地番，以達到「以地統人」的目標，建立了臺灣土地、人民和地理空間的社會秩序。因此日治時期的戶政與地政資料，是今日各鄉鎮最完整、最有規模的地方檔案，透過舊戶籍資料的閱讀，目的在建立對庶民社會的普遍性了解。<sup>27</sup> 此外，古文書、族譜、老照片、私文書、地圖等各種地方文獻的搜集，亦是完成地方史料建構的基礎。再者，廟宇牌匾、碑記等文物的記錄，亦可作為當地開發歷史的呈現，或為廟宇歷史書寫重要的資訊來源。茲簡介本計畫利用之重要資料如下：

一、公私藏古文書：本計畫主要運用保存於研究單位與民間私人手中的土地關係文書，對於區域開墾史、族群關係、熟番土地流失等問題，均提供相當珍貴的資訊。從古文書可具體呈現（1）漢人產業經營情形，如張士箱家

<sup>27</sup> 洪麗完，〈檔案利用與平埔研究：以日治時期之戶籍舊簿為中心〉，《臺灣文獻》50：1（1999年3月），頁17-74。



族文書〈道光 11 年 2 月永豐館業戶張光盛訂定硬租字〉說明張氏家族經營土地的情形；(2) 如〈光緒 18 年西螺添建成美街墾單〉，除了說明西螺建街與振文書院重修經過外，也呈現仕紳參與地方事務的過程及角色。

二、調查資料：光緒 20 年（1894），雲林縣訓導倪贊元所輯《雲林縣采訪冊》，儘管其調查方式不得而知，然其內容可作為理解清末西螺地域的重要資料。<sup>28</sup> 明治 35 年〈本島開發ニ關スル縣內調查報告ノ件〉，以街庄社名分別記載泉州人、漳州人、福州人、廣東人、熟番戶數及人口數，為清末日治初期西螺地域族群分佈狀況的參考。<sup>29</sup> 同時，此份資料也是理解西螺地區何以自成一區謝平安祭祀範圍的重要史料。

三、報紙：如《臺灣日日新報》、《斗六廳報》等，對於清末至日治初期西螺社會的瞭解有莫大幫助。尤其日治初期西螺溪氾濫的情形，若再透過清代方志對該溪的描述，呈現出慣時性的觀察，可勾勒出西螺溪由變動無常乃至定流的發展狀態。<sup>30</sup>

以上資料為本計畫第二章討論的主要憑藉。

四、遊記、文集：此類史料多為地方士紳階級所作，內容載錄當時所見所聞，保留了當時社會經濟狀況、交通情形，是研究當代的社會極珍貴的材料（雖然部分內容需加以辨正）。如曾任贛江府吉江口巡檢、笨港三郊公醫魏照洲之《淡然詩文集》，<sup>31</sup> 以及光緒 19 年縣庠生江藻如之《江藻如詩文集》，<sup>32</sup> 保留諸多清末社會、經濟環境的紀錄。魏氏是中部地區名醫，以載錄各地官紳往來情形為主。此外，書中錄有〈福興宮事略〉，對於沿革、例祭日、歷代住持、進香、匾額等有詳細記載；江氏因於成美街、仁和街經營布莊生意，留有〈江錦德寄錦德本號函〉、〈新溢榮號致錦德寶號江開漢老仁兄函〉、〈藻如稟繼母書函〉等文件，提供當時地方商業情形及社會的描述，尤其呈現廈門與西螺街店舖的貿易狀況，為清末關於西螺街肆、商業網絡與交通路線的重要文獻。文集中另載錄〈光緒 16 年祭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廣福宮天上聖母、福興宮天上聖母〉文，反映地方居民參與信仰的狀況。

五、族譜及相關資料：西螺當地大姓廖、李、鍾、林各姓皆有編纂族譜，甚至留有清代譜牒，舉凡家族遷徙紀錄、世系表等，可運用於移民開發、婚姻網絡等議題的討論。此外，咸豐 8 年（1858）廩生詹錫齡所編纂《河間詹氏族譜》，譜序中言：「我祖于乾隆四十二年浮海來臺，其姓寓在海邊，住居

<sup>28</sup> 倪贊元纂輯，《雲林縣采訪冊》（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方志彙刊第 36 種，2011；1895 年原刊），西螺堡、布嶼東堡、布嶼西堡，頁 166-177、269-289。

<sup>29</sup> 〈臺灣發達ニ關スル沿革調查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明治 35 年（1902）1 月 1 日，第 781 冊，文號 1，頁 207-209、227-229。

<sup>30</sup> 〈濁水溪の調査（一）〉，《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34 年（1901）3 月 27 日，第 2 版；〈濁水溪の調査（二）〉，《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34 年（1901）3 月 28 日，第 2 版；〈濁水溪の調査（三）〉，《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34 年（1901）3 月 30 日，第 1 版；〈濁水溪の調査（四）〉，明治 34 年（1901）3 月 31 日，第 2 版。

<sup>31</sup> 魏照洲，《淡然詩文集》（雲林：西螺輔材文庫，2006；1895 年原刊）。

<sup>32</sup> 江藻如著、鄭定國編，《江藻如詩文集》（嘉義：南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中心，2008）。

幾十年，因漳泉械鬥，遂遷于後浦庄，後復被水崩壞，爰徙西螺街焉。」可瞭解溪流、社會事件與各人群在西螺溪下游地方社會發展中的相互關係。

六、碑銘資料：此類史料的內容，大多數記載事件發生的年代、過程及參與者，是故透過碑文可以清楚的瞭解地方菁英的身份背景，或是參與地方社會的動機、過程與方法，甚至為了解一般民眾參與地方公共事務的重要史料。如〈同治 13 年福興宮重脩碑記〉，記載了「南靖縣眾弟子」、「興郡張大眾弟子」等不同祖籍的信仰組織，及各縣移民參與廟宇的程度。<sup>33</sup> 其次，藉由〈同治 13 年廣福宮重興牌記〉及〈同治 13 年福興宮重脩碑記〉，兩間同時期重修的媽祖廟捐款人名，釐清該廟宇背後所屬人群的網絡關係。

此外，筆者於田野調查過程中蒐集了不少匾、聯等資料，特別是道光 13 年（1831）由北路協副將葉長春所頒，用以表彰鍾、廖、李、林各姓協助平定張丙之亂經過的「好義從風」匾，內含短篇告示，既含讚詞又述緣由與目的，提供了西螺保及布嶼保兩地區居民的社會狀況，藉由懸掛該匾的西螺街福興宮，也能思考該廟作為清代西螺地域信仰中心之面向。

另，福興宮保存了嘉慶 18 年（1813）之八仙螭虎神桌，為西螺街言記號、利源號、隆泰號等三十餘家商號所敬獻，乃相當難得的商業資料。若配合碑文、古文書等文獻，則更能呈現出貫時且有意義的商業活動與地方信仰關係討論。

以上遊記、文集與碑銘資料等，為本計畫第二章主要研究資料。

七、寺廟調查資料：明治 30 年（1897），臺灣總督府下令各地方政府對各地寺廟進行普查，調查內容頗為詳盡包括廟名、建地、廟地坪數、廟產收入、建立年度、地址等，足以反映清末日治初期各地寺廟概況。<sup>34</sup> 有關西螺地域的信仰狀況，從明治 40 年（1907）《西螺堡祠廟齋堂臺帳》、大正 4 年（1915）《社寺廟宇ニ関スル取調書：嘉義廳》、昭和 8 年（1933）《臺南州祠廟名鑑》等內容，除介紹廟宇沿革外，其在神明會的描述甚具特色，諸如南靖心香社、廖姓會等組織，有祖籍、姓氏等作為人群區分的資料，對於理解地方社會的人群網絡，以及人群之於廟宇的關係，提供了珍貴的訊息。

八、民間故事、傳說：筆者在西螺地區從事田野時，採集了諸多傳說故事，舉凡〈福興宮媽祖平定布嶼稟保瘟疫〉、〈楊賢庄拾木刻太平媽〉、〈甘厝庄姑娘成神新街媽祖〉等，透過故事文本的分析，可理解西螺街作為清代西螺保、布嶼保之商業、信仰中心的角色。另一方面，藉由故事亦得以說明何以今日謝平安祭典時，故事發生村莊的居民需要至西螺街請神作客，其彼此間存在何種關係。

<sup>33</sup> 何培夫主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雲林縣、南投縣篇》（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6），頁 33-34、39-40。

<sup>34</sup> 溫國良編譯，《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宗教史料彙編（明治二十八年十月至明治三十五年四月）》（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頁 373。